

書名：《廟堂與江湖——宋代詩學的空間》

作者：內山精也

出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頁數：309頁

作為一位明代文學研究者，拿到內山精也先生的新著《廟堂與江湖——宋代詩學的空間》（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尚未展卷，心裏便在想，如果研究對象是明代，那麼，這本書大概可命名為《廟堂與山林——元明詩學的空間》。以上突如其來的想法，源自本人一直以來的一個困惑：在中國詩學體系中，江湖與山林的異同到底是什麼？內山先生在書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宋代廟堂詩學”的說法，卻沒有“江湖詩學”的相關表述，應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但在此書的封頁上，赫然印著元人黃潛的兩句話：“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為言不得不異。”顯然，這裏的“山林草野”與“朝廷臺閣”，意欲對應的，正是書名中的“江湖”與“廟堂”。一個是南宋詩學研究的寵兒，一個是元明詩學研究的焦點，他們都曾作為“廟堂”的對立面而閃耀於世。但如果將他們從各自朝代中提出來，置於中國詩學的通代視域下來考察，似乎大家更偏向於使用“山林”這一概念。我們不禁要問，“江湖”到底發生過什麼，它在詩學史上的位置，為何終被“山林”所取代？

如果我們讀過內山先生之前的專著《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就會明白，從北宋的蘇軾，到南宋的江湖，正反映了作者十餘年來學術關注點的轉向。對沒有讀過《傳媒與真相》一書的讀者來說，《廟堂與江湖》中的第一篇《宋代士大夫的詩歌觀》，大概是最合適的入題文章。雖然在近年的研究中，“廟堂”已經不再是內山先生的重點，但過往的學術積累，讓他充滿信心地提出了“廟堂詩學”的概念，並對士大夫詩人的價值構造及其詩學位置，作了精妙的整理。使讀者在閱讀伊始，便進入了一個已經精心設計好的詩

學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一套檢驗士大夫身分特征的理想範型(以下簡稱“內山範型”),兩宋以來的諸多文學現象及詩學觀念,皆可在此理論框架下,作出合理的解釋。自然,這一套理論,也為讀者接下來了解南宋的江湖文學,提供了頗為便捷的認知保障。

“內山範型”的基礎,是“官一學一文”三位一體的身分建構,這不難理解,王水照先生已有論說(《宋代文學通論》,頁27)。三股力量相互牽引、此消彼長所造成的身分位移,通過書中構圖,亦一目了然。在筆者看來,內山說的最大推進之處,不在於用三要素的進退,來解釋各種文學現象的合理性,而是用同一套解釋法,消彌宋代各種詩風、詩說之間的張力,展現出可作歷時式闡釋的動態統攝力。原有文學史視野下的兩宋不斷演變的詩學觀,成為同一套理論下的數次內部調整;晚宋江湖詩派的崛起,也從舊有的諸多演變中的一種,變成了超越於其他宋代詩學話語、具備更長時段意義的詩歌史巨變。這套理論的闡釋力和破壞力,其實是相當大的。但全書的重點,其實不在宣揚這一套士大夫的理想範型,而是希望解決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解釋在這一範型之外的諸種文學活力。我們必須承認,當某些人主動放棄對官、學前景及其知識結構的追求的時候,“內山範型”的闡釋力便失效了。作者顯然認識到了這一點,故後來將興趣轉向了那些“熱衷於與士大夫詩人相異的詩歌創作原理的江湖詩人”(頁307)。從這個角度來說,《詩歌觀》作為其士大夫文學研究的終結篇,有其學理上的必然性,而他想要做的,或是建構另一套可以用來充分解釋江湖詩人的身分範型。這種範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用來解釋“元明清近世社會中的市井詩人們”(頁35),否則,便不足以與之前的士大夫範型形成身分及持續時段上的均衡關係。

或許不少讀者對“廟堂”或“江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可否認內山先生對此也有精彩的論說。但在筆者看來,作為廟堂與江湖之擺渡人的陸游與楊萬里,是全書一條很重要的草蛇灰綫。他們如影隨形,相互映襯,使讀者能順利地跟著兩位大詩人的腳步,從廟堂文學世界移步到江湖文學世界。與陸游在近世之川流前駐足觀望不同,楊萬里是一位勇敢的涉水人,率先唱出了江湖詩的先聲。故與傳統文學史中對陸游的評價高出楊萬里不同,在內山先生的筆下,

陸游的身姿更像一個面相有別的襯影，為即將出現的朋友多次暖場，以更好地映襯楊萬里的時代性。在第一部分對士大夫理想範型的建構中，他們尚站在同一陣營中，其平易放達詩風的回歸，被解釋為政界壓抑的言論環境的解除，較之先前江西詩派的晦澀詩風，他們被視為重回官僚立場，積極創作詩歌，確保“官一學一文”三者詩歌領域的平衡（頁 30）。但在第二部分“長淮詩境”中，基於對宋代邊塞詩類型的分析，作者確立了“把士大夫詩人的意識形態視為絕對的陸游”和“持有更為相對態度的楊萬里”（頁 113）兩種姿態。這時候的楊萬里，便已潛藏著從士大夫理想範型中逸脫出去的傾向，而檢驗這種傾向的工具，就是詩人們對晚唐詩的態度。文學史一向對“晚唐體”評價不高，但在作者眼中，卻是“占取時代的先機而引導了時代的”（頁 113），這無疑是對現有文學史觀的一種挑戰。

隨著論證的推進，在第三部分中，作者亮出了他最拿手的武器，即出版與傳媒。在對詩人自編詩集及其生前刊行現象的討論中，陸游和楊萬里再一次聯袂登場，他們與北宋蘇軾及“蘇門四學士”，同時代的朱熹、洪邁，晚宋的劉克莊、戴復古、許棐一起，構成了一條關於“詩人”自覺的演變脈絡。在“內山範型”的解釋下，生前刊行詩集，是向當世社會最大限度地強調“詩人”自覺的一種行為（頁 173），而這種姿態的另一面，就是對士大夫理想範型的否定與背叛。對江湖詩人來說，這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向上資源；但對士大夫文人而言，卻是一種無法承受的輿論之重。連陸游這樣發出“此身合是詩人未”之問的文人，在這般沉重面前，也不得不放慢自己的特立獨行。與之對應，楊萬里在生前不厭其煩地刊行詩集，無疑是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個時候，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文學評論中“熱情”“先進”等明顯帶有褒義的詞匯，到底是以作品的內容、風格來評價，還是以作者對新事物的姿態來評價，將讓陸游、楊萬里二人走到方向不同的文學史位置上。

這種“當代文學可由印刷而傳播”的觀念，內山先生稱之為“楊萬里的選擇”（頁 203），成為後來江湖詩人們的普遍做法。楊萬里雖不是江湖詩人，但對經典作家的重新闡釋，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那些不在經典評價體系內的江湖詩人的時代先進性。《江湖集》之於《江湖小集》的意義，也不再止於書名的雷

同,而被追加賦予了新的內涵。內山先生將晚宋的時代,視為一個士大夫與出版建立新型關係的時代,較之先前由士大夫主導的“著者—編者—書肆”三者關係,晚宋的職業編集者,開始對著者提出強制性的要求(頁 199)。詩集生產的決定性環節,從蘇軾等人的抗拒或猶豫,變為以陳起為主導方的策劃與編纂。作為新技術的印刷業,無論被視為天降神器,還是洪水猛獸,都在無形中改變著士大夫的文學觀念及行爲。就像我們現在猶豫,到底擁抱還是觀望數據庫的建設與使用,其實都是徒勞的,被時代潮流席卷將是必然的命運。蘇軾和陸游,不過幸運地站在潮流襲來的前夜罷了。

較之前作《傳媒與真相》,新著在時間上從北宋進入了南宋,在社會階層上從士大夫轉向了布衣。表現出作者對通貫性的更自覺追求,這從兩書的副標題上,即可見一斑。但無論是“詩人自覺”,還是“詩之近世”,都不是集中在南宋一代便可解決的問題。需要作者對元、明兩代有更深入的认识,也需要對整個中國詩歌史有更融通的 understanding,及善於變形的眼光。在這方面,內山先生作了普遍的探索,而在筆者看來,仍有很大的空間。以下說一些碎片式的想法,與內山先生商榷。

到底“江湖詩學”可否成立? 之前的研究者,包括錢鍾書、張宏生、侯體健等先生,皆持謹慎的態度。內山先生自己也認為,“沒有作為一個詩派的獨特詩學主張被明確倡導的形迹”(頁 233)。但在嚴格意義上,“廟堂詩學”也不是詩派的產物,它是某一類意識形態、生存方式、知識結構等在詩歌層面的認同與總結。這關係我們眼中的詩學,到底是一種學說理論,還是一種創作原理? 或者說,作為創作原理的詩學面相,是否有被專門研究的價值? 如作者所梳理的,晚宋的江湖詩人,在題材的日常生活化、五律七絕的寫作習慣、對典故辭藻的棄用、學詩門徑的轉變等方面,都體現出一種近似“晚唐體”的創作傾向。而這股潮流背後的主力,是作者所說的“非士大夫知識人”(頁 249)。這一去精英視角,在日本漢學界有一貫的傳統,從村上哲見先生提出的“專業的非官僚文人”(《宋詞研究·南宋篇》,頁 10),到甲斐雄一博士提出的“中間層文人”(《南宋の文人と出版文化》,頁 8),莫不如此。顯然,這是一個較松散且永遠不會斷絕的群體,其創作宗旨及法徑的覆蓋面相當寬泛,並不符合學界對文學

流派的界定標準。但一個文學群體的核心，從創作優秀作品、提出獨特理論主張的精英分子，到擁有傳媒頭腦與組織魄力的傑出經理人，未必就不可以指向一種作為創作原理的詩學範式的轉變，就像西方藝術商人對現代繪畫流派的挖掘、支持與引導一樣。既然內山先生已經視陳起為江湖詩派的實際領袖（頁233），這顯然是對古典文學流派之架構模式的一種顛覆，那麼，更自覺地勾勒“江湖詩”的多維面相，將之置於與“廟堂詩學”對等理論高度的視域下來考察，未嘗不是一次有益的嘗試。至少兩宋士大夫詩風的演變，我們可以用“廟堂詩學”的三角結構來闡釋，而江湖詩與元明的山林詩、市井詩、山人詩的異同，尙未有一套理論可以作出通貫的解釋。

筆者之所以重新探問“江湖詩學”的可能性，在於如果我們跳出兩宋觀看“江湖”，會發現其前後皆為“山林”。之前是貴族的“溪山林泉”，如王維、韋應物等；之後是庶民的“山林草野”，如陳獻章、莊昶等。而在兩個山林之間，曾經有一片江湖。與山林的靜態、內斂、不隨時好不同，江湖是流動的、外放的，世俗的，且表現出浩渺的漂泊感。如果我們只是將“江湖詩”視為一群難登大雅之堂的詩人的抱團行爲，那麼，為什麼“江湖”的名號沒有在元明文學中延續下去呢？按理說隨著“近世”的發展節奏，這一群體的勢力只會越來越壯大。內山先生將元代士大夫的復古努力，視為一種詩歌整風運動（頁301），但也承認在“中央與地方”的士大夫二極之外，已有第三極的存在，即擺脫“士”之認同、完全將詩歌當做自我表達手段而愛好的作者層（頁302）。從這個角度來說，元明的山林詩人，到底應納入士大夫範型，還是新的範型，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與江湖詩人較近的，反而是明代的市井詩人、山人詩人，甚至清代文學中大量出現的鄉鎮詩人群落。但若真如此，這個可能的新範型，到底能在以“近世”自居的元明清文學中占據多大的比重，又將成為新的疑惑。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即使“江湖詩學”宛若流星，轉瞬即逝，通過與此後類型相近而代興的文學現象的比較研究，或可挖掘出“江湖詩”更多有“光芒”的詩學特質來。

廟堂與江湖，本質上是一個關於詩學空間流轉的話題，內山先生將之上升至“詩人自覺”與“詩之近世”的討論，已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這個話題的內涵。但在嚴格意義上說，無論是“詩人自覺”，還是“詩之近世”，只要集中在晚宋元

初,便只是關涉“近世”的發生而已。如果內山先生接下來有意作一些通貫宋元明三代的考察,那便關涉“近世”的形態,而且是基於近世複雜性的觀察之上的普遍形態,而不是基於近世原生性的觀察之上的早期形態。若真如此,絕對是學術界的幸事。但即使沒有,這仍是元明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課題,對元明文學研究者來說責無旁貸。因為這既是元明文學在獨特性上需要作出的貢獻,更涉及對其他時代研究中的文學階層理論的呼應與補充。當然,這需要研究者對宋元明清數代文學甚至中古、近世文學有一個整體且具層次感的把握,亟待有能者為之,與內山先生形成新的對話。

(作者:浙江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葉 曄)